

纪作亮 著

張籍研究

黄山书社

纪作亮 著

張籍研究

黄山书社

1081977

责任编辑：王政白
装帧设计：方绍武

张籍研究

纪作亮 著

*

黄山书社出版

(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 字数：90,000

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2,000

统一书号：10379·29 定价：0.90元

DC 62/50

前 言

唐诗是我国古代诗歌艺术发展的顶峰，是我们祖先创造的金光璀璨的精神瑰宝。唐代在短暂的二百八十九年间，诗人辈出，写出了大量的光辉诗篇。李白、杜甫和白居易象巍然屹立的三座高峰，已列入了世界文苑之林，享有极高的全球声誉。张籍是中唐时代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，他的熠熠生辉的诗篇，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。有的诗篇已传至国外，受到国际友人的赞誉。张籍师法杜甫，又受到白居易的极口称赞，可以说是杜甫与白居易这两座现实主义高峰之间的重要桥梁。他在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历史功绩，受到了当代及后世的充分肯定和普遍重视。

“阳春召我以烟景，大块假我以文章”，李白说出了唐诗产生的时代背景。唐诗内容繁富，意蕴丰赡，堪称我国古典诗歌的典范。我们学习和研究唐诗，也增强了民族自豪感。对于唐诗这笔极可宝贵的文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工作，历代都在相继进行，并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。新中国建立以后，党提出了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

针和“古为今用”的原则，为研究和继承古代文学遗产，指明了正确的方向。许多人为研究唐代文学，付出了巨大的劳动，尽管曾受到极“左”思潮的干扰，还是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。对于张籍的研究，同样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。

历史上关于张籍的研究工作，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：一是评价阶段。中唐时期，张籍的许多同辈诗友，曾对张籍的诗歌作过总的估价。最有代表性的要算是白居易的《读张籍古乐府》，其中全面评价和高度赞扬了张籍的诗歌创作成就。韩愈、王建、孟郊、贾岛、姚合等人，都对张籍诗歌作过评价，但均为结论性的简评和赞语，没有进行什么分析。五代南唐末年，张洎花了二十多年的努力，为张籍辑成《木铎集》，曾撰了一篇序文，文中说：“公为古风最善。自李杜之后，风雅道丧，继其美者唯公一人。”这还是总评，仍未作任何具体分析。二是分析阶段。到了宋代，《诗话》勃兴，文艺评论出现了新局面。对张籍诗歌的评论，也作了许多具体的分析。如：尤袤的《全唐诗话》、刘攽的《中山诗话》、陈师道的《后山诗话》、周紫芝的《竹坡诗话》、许颢的《彦周诗话》、强幼安的《唐子西文录》、张表臣的《珊瑚钩诗话》、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、刘克庄的《后村诗话》、张戒的《岁寒堂诗话》、曾季狸的《艇斋诗话》、黄彻的《恐溪诗话》、范晞文的《对床夜语》等，都对张籍的诗歌，进行了一些分析评论。其后元、明、清三代，也有不少分析张籍诗歌的片断。其中也有不同的看法，大抵是褒胜于贬。明代正德十

年(公元1515年),刘成德为张籍编了一本诗集,并作了一篇序文,将张籍与韩愈等人的诗歌作了比较分析。他说:

“余并其诗而观之,其乐府诗,景真情真,有风人之意;而五言近体,又皆劲健清雅,脱落尘想,俱从胸臆中出。然后知昌黎之诗丰而腴,柳州之诗峭而劲,司业之诗新而奇,李翱之诗悲而壮,卒皆可传。惟东野之诗,则有穷促寒苦之状,吾恐温厚之教,或不若是。观者自有巨目,不待余赘言也。”

综观自宋至清各代对张籍的评论,明显的特点是对问题作了必要的分析。这种分析绝大多数是从艺术技巧方面着眼的,间或也有一些纪事和比较的内容。总之,比唐代的总评,要算是前进了一大步。三是探讨阶段。解放以后,有一些人对张籍及其诗歌,进行了不少开掘和探索工作。徐澄宇在选注《张王乐府》的“导言”中,探讨了张籍诗歌的成因。他从社会情况、文学传统和诗人阅历等方面,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和分析,显然是很有意义的。卞孝萱的《张籍简谱》(《安徽史学通讯》,1959年,4.5期合刊),潘竟翰的《张籍系年考证》(安徽师范大学学报,1981年第二期),都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张籍的生平事迹和作品系年。李听风的《谈张籍乐府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》(《文学遗产》增刊,第一辑)、张国伟的《试论张籍诗的现实意义》(《唐诗研究论文集》)、华忱之的《略谈张籍及其乐府诗》(《文学遗产》增刊,第三辑)、莫乃群的《从张籍诗中提出的社会问题》(广西日报,1963年12月3日)、陈力的《试论张籍的乐府诗》(昆明师院学报,1979年第二

期)等,都是研究张籍的重要文章。这些文章都不同程度地起到了“垦拓荒宇,以利来者”的作用。此外,还有一些人对张籍的诗歌进行了具体的解说,也都是很有价值的。

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,我试着对张籍的时代、生平、思想和诗歌,进行了较全面、较系统的研究。这本拙著就是这个研究的初步收获。当然,书中瑕瑜互见的现象也是存在的。这就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去认真探索。

在写作过程中,中共和县委员会与和县人民政府给予了深切的关怀和极大的支持,并得到了汪树森、韩玉琴、张吉道、洪涛、罗本才等同志热情的帮助,在这里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纪作亮

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二日于合肥

目 录

- 一 张籍的时代 (1)
- 二 张籍的生平(15)
- 三 张籍的思想(27)
- 四 张籍的诗歌(65)
- 五 张籍的影响 (143)

一 张籍的时代

研究一个人的社会贡献，必须首先注意到他所处的时代条件。一个杰出诗人的出现，总是和他的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。时代孕育了诗人，诗人反映了时代；时代培养了诗人的优秀品格，诗人谱写了时代的壮丽赞歌。诗人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忠实儿子，他的优秀诗篇都是时代的产物，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。别林斯基说得好：“诗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是自己时代的产儿”（《别林斯基论文学》）。一个诗人必须呼吸时代的空气，才能产生辉煌的诗章。没有时代的营养，就不能产生时代的歌手。因此，我们在研究诗人张籍时，必须首先了解中唐社会的时代特征，进而体会中唐时代在张籍身上打下的社会烙印，并从张籍的诗歌中，去观察当时的时代面貌。

中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又一次发生巨大动荡的时代。唐王朝曾经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封建帝国，盛唐时代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昌盛，是当时世界各国都无与伦比的。但是，到了中唐时代，社会浇漓，风雅道丧，国运衰颓，一蹶不振。表面上还能维持着统一的国家局面，实

实际上已是危机四伏，到了即将全面崩溃的边缘。统治阶级罪恶昭彰，广大人民灾难深重，异族敌人肆意入侵，民族危机日趋深化，整个国家处于火山爆发的前夕，李唐王朝统治者宝座上的所谓“祥云瑞气”正在随风散去，那个“开天盛世”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张籍就是生活在这个风云暗淡的时代。他一生约五十九年，基本上是在贫苦之中度过的。尽管如此，他没有袖手旁观地沉沦下去，而是跟着时代的潮流前进，用自己的诗歌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课题，生动地描绘了时代的图卷。正如中华书局《张籍诗集》的出版说明中所说的那样：“在他的诗篇中，他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和人道主义精神，比较广泛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：统治者的战争罪恶带给广大人民的苦难，异族入侵人民所遭受的蹂躏，统治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高度剥削和残酷奴役，劳动人民的极端贫困，以及封建社会中妇女所遭受的不幸等等。总之，他同情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，大声疾呼地替他们申诉，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和愿望。”

张籍的时代，是民族灾难日益深重的时代。安史之乱平定后，唐王朝国势日趋衰颓，吐蕃、南诏和回纥等异族的上层贵族，先后不断地侵犯中原，并且占领唐王朝京畿西北的重要地带，陇西、河湟地区长期沦陷，出现了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。

吐蕃源出于羌族，其后发展而成为现在的藏族。吐蕃当时在我国西南边陲，都城在逻些城（即今拉萨）。唐代前

期与吐蕃的关系较为亲善，唐太宗时文成公主远嫁吐蕃首领松赞干布，唐中宗时金城公主又嫁与吐蕃赞普尺带珠丹。两次和亲，促进了唐王朝与吐蕃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，双方的关系日趋亲密。但在安史之乱后，唐王朝国势衰微，吐蕃统治者便乘机进扰。《旧唐书·吐蕃传》中说：“及潼关失守，河洛阻兵，于是尽征河陇朔方之将镇兵，入靖国难，谓之行营，曩时军营边州，无备预矣。乾元之后，吐蕃乘我间隙，日蹙边城，……埋没者数十州。”唐代宗广德元年(公元763年)，吐蕃侵占秦、成、阶三州后，又夺取兰、廓、河、鄯等陇右之地。其后，唐泾州刺史高晖为内应，吐蕃兵深入内地，又侵占了唐王朝都城长安。由于人民奋起还击，挫败了吐蕃侵略军的锐气，不久唐将郭子仪收复了长安。吐蕃兵退出长安后，又盘踞于凤翔以西、邠州以北一带，仍不断侵犯中原。后来又时战时和，历史在矛盾冲突中前进。至唐武宗会昌年间(公元841~846年)，沙州(甘肃敦煌县)人张义潮，带领汉人起兵，赶走了吐蕃侵略者，收复了陇右之地十一州复归于唐。

南诏原分蒙舍、濛賧、施浪、浪穹、越析、蒙嵩等六诏。蒙舍处五诏之南，后兼并五诏，故称之为南诏。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(公元639年)，南诏将太和城(在今云南大理市)定为国都。唐初南诏正在兴起，与唐王朝关系较好。高宗时，南诏首领细奴逻、逻盛炎、盛皮罗常遣使到唐王朝进贡，唐王朝也赐以锦袍缯彩等物。但因为唐王朝的边将腐朽堕落，对待南诏非常无礼，曾激起南诏的反抗。剑南

节度使鲜于仲通和云南太守张虔陀因对南诏“倍税军粮，征求无度”，南诏便于唐玄宗天宝九年(公元750年)起兵杀张虔陀，接着又大败鲜于仲通。此后南诏又西连吐蕃，合力反唐，给唐王朝造成了很大的威胁。后因南诏与吐蕃的联合阵线发生矛盾，南诏又与唐王朝讲和，联唐以抗吐蕃。唐王曾派剑南节度使韦皋与南诏议和，赐南诏金印，从此唐与南诏又恢复了友好关系。到了唐文宗大和三年(公元829年)，剑南节度使杜元颖“治无状，障候弛沓”(《旧唐书·南诏传》)，南诏统治者乘机进犯，攻入成都。此后唐王朝与南诏的战争连年不绝。唐懿宗咸通七年(公元866年)，唐将高骈曾置重兵戍守南疆，以防南诏袭扰。但因士兵久戍不得换归，激起了庞勋为首的兵变，后来终于发展成为农民起义。南诏也因北拒唐朝，西抗吐蕃，力量消耗过大，逐步地趋于衰落。

回纥与突厥是同一种族，就是现在的维吾尔族的祖先。唐太宗贞观二十年(公元646年)，回纥首领吐迷度，战败薛延陀，又和唐联合将薛延陀灭掉。回纥便又越过贺兰山，进入黄河流域，并归顺于唐。唐太宗曾亲自至灵武接见，双方的关系和好，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。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，回纥势力日益强大，曾出兵侵扰凉州等地。其后回纥不断发展，成为当时北方最强盛的少数民族政权。安史之乱时，唐王朝曾向回纥求援。回纥曾发兵助唐收复两京。回纥助唐收复两京时，曾大肆抢掠，人民深受其害。回纥统治者因助唐收复两京有功，便恃功强迫与唐进行马、绢

等物的不等价交易。《旧唐书·回纥传》中说：“回纥恃功，自乾元之后，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，仍岁来市，以马一匹，易绢四十匹，动至数万马。”正因为如此，弄得唐王朝“财力屈竭，岁负马价”（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）。除了马绢不等价交易外，唐王朝还要每年送绢两万匹到朔方军，交给回纥统治者作为助唐作战的报酬。唐代宗时，回纥又曾被唐叛将仆固怀恩引诱，与吐蕃联合进攻奉天、凤翔、同州等地，人民遭到了回纥军队的严重侵害。其后象这样的侵扰掠夺现象几乎连年不断，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

综上所述，吐蕃、南诏和回纥等异族敌人的侵扰，使得唐王朝的经济日益破败。特别是唐代宗、唐德宗统治的时期，异族敌人的侵扰尤为严重。三番五次的烧杀淫掠，都市和农村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，社会呈现着一片萧条景象。张籍的许多诗歌，都真实地反映了这个严峻的现实，为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面貌，提供了直接的艺术资料。

张籍的时代，是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时代。安史之乱后，唐王朝皇室的财力更加空虚，但统治者仍要维持其腐朽奢侈的生活；各藩镇节度使也都是俨然的小皇帝，他们亦如皇室那样骄奢淫逸，挥霍无度。人民蒙受着皇室与藩镇的双重剥削，加上贵族大地主集团的疯狂掠夺，大量兼并土地，结果是“富者兼地数万亩，贫者无容足之居”，贫富两极分化非常严重，阶级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。由于商业的急剧发展，高利贷剥削也活跃起来，更加速了

农民的破产。官僚、地主和商人犹如三座大山，一齐压在劳动人民头上，大批农民破产逃亡。封建社会固有的阶级矛盾，正在不断加深和激化，整个社会出现了“人烟断绝，千里萧条”的景象。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，一场农民起义的暴风雨即将来临。

唐王朝的统治者因平定了安史之乱，大肆吹嘘什么“中兴盛世”。他们的生活更为腐朽，对人民剥削日益加重。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，骇人听闻的繁重徭役，好象两股钳子把人民夹得透不过气来。就赋税来说，初唐实行的租庸调法已完全破坏，此时已由两税法代替。唐德宗建中元年(公元780年)，实行的两税法规定：凡定居的人，分夏、秋两次纳税，夏税不得超过六月，秋税不得超过十一月。两税都按钱计算。田税以唐代宗大历十四年(公元779年)的垦田数为依据。租庸调及其他一切科目全部废除。并且还规定，“敢在两税外加敛一文钱，以枉法论”。初行两税法时，百姓也还有些好处。因为总算是有了统一的税制，比起乱收赋税要好得多。但到后来又胡乱收税，农民受害比改制前更为严重。农民的收获物又通过高利贷者变钱输入官府，更加重了剥削。白居易的《杜陵叟》一诗写道：“典桑卖地纳官租，明年衣食将何如！剥我身上帛，夺我口中粟，虐人害物即豺狼，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！”

地主豪富剥削农民，也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唐代庄园经济的发展，迫使农民被兼并而失去土地。官僚地主的私人庄园和僧侣地主的寺院庄园都非常普遍，所占的土

地也都很多。私人庄园都有豪华的住宅和园林花圃，土地由那些被剥夺而失去土地的农民耕种。关于私人庄园的剥削，陆贽曾说：“今京畿之内，每田一亩，官税五升，而私家收租，殆有亩至一石者，是二十倍于官税也；降及中等，租犹半之，是十倍于官税也。……官取其一，私取其十，穡人安得不困！”（《陆宣公集·均节赋税恤百姓》）。此外，有的地主豪富侵吞产业，并不转户，原主尽管失去土地，仍须负担赋税，而官府并不过问。寺院庄园，有的属于寺院所有，有的属于僧侣私人所有。僧侣私人所有的庄园，与世俗地主的私庄相同。寺院所有的庄园，由知庄或知墅的职事僧管理。这种庄园占田之多，是十分惊人的。如少林寺有柏谷庄，占田四十顷；越州阿育王寺有田十顷，尽是“陆水膏腴之沃壤”（王昶《金石萃编·阿育王寺常住田碑》）；山东长白山醴泉寺，亦有“庄园十五所”（僧园仁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）。寺院庄园的苛重剥削，曾激起人民的反抗。及至唐武宗时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，毁寺院四千六百所，蓝若招提四万余所，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，检出奴婢十五万人，并“收膏腴上田数千（十）万顷”（《旧唐书·武宗纪》）。

商人的剥削，到了中唐时代更为严重。此时国民经济萧条，但商业仍很活跃。富商大贾，到处都有。尤其是两税法推行后，农民必须把粮食和绢布变换成现钱才能纳税，这就给商人增加了更多的获利机会。有个商人名叫王酒胡，曾捐款三十万贯，资助重修朱雀门。其后重修安国寺时，

皇帝命能舍钱一千贯者，撞钟一下。“王酒胡半醉入来，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，便于(长安)西市运钱十万贯入寺”（尉迟偓《中朝故事》）。

官僚、地主和商人三位一体剥削劳动人民，以致民不聊生。当时的百姓真正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挣扎在死亡线上。阶级矛盾愈演愈烈，整个国家好象处在火山口上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剥削阶级的奢淫，劳动人民的苦难，在诗人的笔下得到了深刻反映。杜甫的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就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贫富对立的状况。

张籍的时代，是政治局面复杂混乱的时代。国家的政局极不稳定，举国上下混乱不堪。朝廷是宦官掌权，朝臣结为朋党，朋党与宦官之间，既有勾结又有斗争。地方是藩镇割据，各藩镇之间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。宦官和藩镇势力的恶性膨胀，使得中央集权的皇室已处于名存实亡的地位。

中唐后期的朝廷大权，主要是操纵在宦官手里。唐宪宗、唐敬宗就是为宦官所杀，有许多皇帝就是宦官拥立的。实际上皇室的军政大权均落在宦官之手，皇帝不过是个傀儡罢了。宦官设法使皇帝沉于声色，不理朝政，自己“总天下大政，外专陛下之命，内窃陛下之权，威慑朝廷，势倾海内”（《旧唐书·刘蕡传》）。宦官专权，是唐王朝政治混乱的重要原因。

中唐后期的朝臣朋党之争，主要是李牛之争。李牛之争的开端，起于唐宪宗元和三年(公元808年)，先后延续了

三十多年。开始是李德裕以私人成见排斥李宗闵，其后李宗闵与牛僧孺依附宦官反对李德裕。唐文宗大和三年（公元829年），李德裕被召入朝，任兵部侍郎，后为宰相，仍被李宗闵排斥而去做义成（治滑州）节度使。李宗闵又引牛僧孺为相，竭力斥逐拥护李德裕的朝官。唐文宗大和七年（公元833年），李德裕复为宰相，也同样大肆排斥牛党朝官。仅一年时间，李德裕又遭贬谪。李宗闵继之为相，将李德裕为相时的朝官纷纷调动，弄得朝廷上下不宁。唐文宗开成五年（公元840年）至唐武宗会昌六年（公元846年），李德裕又再度为相，深得武宗的信任。他辅佐武宗办了几件大事，朝廷颇有振作气象，但武宗死后，宣宗又重用牛党，将李德裕罢相，贬死于崖州（广东琼山县）。李牛两派拉锯式的斗争，将朝廷弄得乌烟瘴气。

中唐时代，已形成了割据称雄的分裂局面。那些割据一方的藩镇，虽然保持着唐王朝的官爵，但在实际上已是独立的政治集团。在所割据的区域内，他们可以招集党徒，练兵修城，自收赋税，制定法令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。当时主要有河北三镇：魏博镇、成德镇和幽州镇。三镇的统治集团基本上是安禄山势力的延伸。他们在宪宗时虽也表面愿意归顺朝廷，但在宪宗死后又恢复了割据局面。三镇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相当激烈。三镇的人民深受其害，不断燃起反抗的烽火。唐王朝为抵御三镇，又加重搜刮以扩充军费。朝廷与藩镇的对峙，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。